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世界人权宣言》的发展

□ 江 凯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17A（II）号决议，标志着在国际人权领域中具有奠基性地位的《世界人权宣言》得以颁布。迄今为止，《世界人权宣言》已走过70年的历史，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巨大影响已经深深体现在国际关系、国际道德、法律等各个方面。和平、发展和人权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标志性特征。

与此同时，当代国际秩序也面临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为了应对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明了国际秩序升级发展的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了新版国际秩序的理想目标。2017年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相继写入联合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并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章与宪法的序言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继承了《世界人权宣言》所设立的各国努力实现的目标与平等自由的基本价值理念，还赋予国际人权以新时代的具体内涵，理念所包含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五大支柱，既同《世界人权宣言》的目标和价值高度契合，又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特征。

持久和平是保障人权不可或缺的条件。和平权作为一项集体人权，是实现生存权的首要条件。《世界人权宣言》指出，承认和尊重人权是世界和平的基础。在当今时代，世界各国

相互依存、利益休戚相关，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平的需要尤其迫切，和平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正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这要求各国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在推进持久和平、确立权利与自由得以充分实现的进程中，中国一贯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和平与发展仍旧是时代的主题，国家之间应当保证和平相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将和平权这一概念上升到制度层面，通过一系列的规则规范与组织程序形成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

推动普遍安全世界的建设是保障人权的基本前提。《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安全权作为一项自然权利，是享有其他人权的基础。在当今国际社会，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安全都是基本需要。在人类利益交融程度不断加深，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在面对全球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持续威胁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种维护共同安全的新安全观。这同《世界人权宣言》倡导的价值是完全相同的，而“共同安全”这一新理念也正是人类共同命运的内在要求。2017年，联合国安理会秉着“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一致通过了关于阿富汗问题第2344号决议，随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又被纳入两份联合国安全决议之中。可以说，《世界人权宣言》要求“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要求创建并维持一种基于“共同安全”的国际合作机制，加强全球安全共同治理，以建立和平安全的国际新秩序，为世界各国人权的保障提供安全的基本环境。

促进社会共同繁荣有利于充分保障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推动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国的发展经验，既继承了《世界人权宣言》中对各国付诸国家努力以保障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要求，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落实人权保障提供了新的借鉴。由于国情的不同，每个国家都可以找寻适合本国情况的人权发展道路，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打破了“单一国家发展”的桎梏，强调一国不可能脱离其他国家的利益而单独发展，这种“国际经济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最终促进了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的目标，也促进了尤其是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真正实现。中国提出或创设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等，始终欢迎其他各国搭中国发展的便车，这也是中国“共同发展”理念的表现。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有效促进发展权的实现，推动世界各国共同繁荣。

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与特殊性，使得对人权的保障必须要建立在包容开放的基础之上。《世界人权宣言》倡导各种文明开放包容、交流互鉴，“非歧视原则”始终是国际人权领域的关键原则之一，并在后来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中占据重要位置。不容忽视的是，《世界人权宣言》不仅仅是现代国际人权法的基石，它为国际人权保护所创设的“共同标准”，已经超越了文明之间的差异，这种“普遍性”的人权也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价值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样强调文明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并提倡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开放包容的理念，既包含了平等与非歧视的内容，关注文明中对人权理解与实践的共性，也不排除人权在不同文明间的特殊性 with 差异性。与此同时，包容开放意味着过去的“国际人权斗争”应当向各国在人权领域的合作对话转变，最终使保护人权成为目的，而非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

保障人权要求各国作出构建清洁美丽世界的努力，即保障环境权。由于所处时代的限制，在《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过程中并没有包含对保障环境权的界定，但不能否认环境权是一项重要人权。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类共同家园所面临的共同风险的一种积极反应。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中国把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通过法律、行政、技术、市场等多种手段，全力推进各项工作。与此同时，在推进国内环境保护工作的同时，在国际层面也认识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性，倡导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加强环保领域的国际协调与合作，携手共同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香、生机盎然的田园风光，为京津冀再造一片“城市绿肺”。

倾心用力改善群众生活。深化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提升学前教育质量，增加优质学位供给，深化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落实对口帮扶承德市“1+4”合作协议，助力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水平，加强社区网格化治理。发挥好首都政治护城河作用，坚决打击各类渗透颠覆破坏、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等活动。提高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水平，进一步加强市、区两级“两中心两站”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着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立德树人，抓好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深化“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引导师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小我融入大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建功立业。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深入开展师德师风建设，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加快高校“双一流”建设，支持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支持一批高等院校建设世界一流学科，推进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建设，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职院校和中职院校，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天津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延伸党在农村的工作触角。2016年10月印发的《关于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方案》，确定在全国18个县（市区）的24个村开展试点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加强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党组织建设。下一步，要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稳步扩大试点范围，推动乡村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破解农村发展难题，实现组织振兴。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干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专题研讨班学员、海南省委副书记〕

英国脱欧谈判启动以来，保守党内留欧派（希望英国继续留在欧盟）、软脱派（主张渐进脱欧，通过谈判达成有利英国的脱欧协议）和硬脱派（主张彻底干净脱离欧盟，甚至可以无协议脱欧）因立场不同，在议会中展开了错综复杂的辩论，造成当前执政的保守党内部派别裂痕。英国与欧盟相互嵌入很深，英国脱欧是当前整个欧洲的重大事件，这就注定英国脱欧将是一场旷日持久之战。

脱欧进程中保守党各派立场

留欧派与脱欧派。2015年英国举行大选，卡梅伦为赢得连任，在党内外脱欧呼声的巨大压力下，为争取脱欧派的选票，承诺如果他赢得连任，将进行脱欧公投，卡梅伦如愿赢取连任后，宣布于2016年6月23日进行脱欧公投。由于卡梅伦允许保守党成员自由选择立场，保守党议员的留欧派和脱欧派在脱欧公投前已经公开对立。留欧派以首相卡梅伦为首，脱欧派以鲍里斯·约翰逊为领袖，双方不仅进行了多次激烈辩论，而且都不遗余力为各自的主张宣传造势，约翰逊还联合迈克尔·戈夫对抗卡梅伦，并且几乎跑遍英伦三岛为脱欧摇旗呐喊。保守党领袖及党内重量级人物的公开斗争，导致保守党内留欧派与脱欧派的对立与分裂。2016年6月24日，脱欧公投结果脱欧派胜出，卡梅伦虽然赢得了2015年大选连任，但此时被迫宣布辞职。

软脱派与硬脱派。脱欧已成定局，保守党作为执政党必须推进脱欧谈判。卡梅伦辞职后，保守党经过党内竞选角逐，特蕾莎·梅胜出，成为保守党领袖并接任英国首相，着手启动脱欧事宜。由于保守党硬脱派和软脱派实力差距不大，二者之间的较量比较激烈。梅首相上任后遭遇党内外掣肘，脱欧进展缓慢，她试图利用当时保守党民调支持率较高的时机，通过提前大选为脱欧谈判争取主动，但是2017年6月8日大选保守党失利，不仅没有赢得下议院多数席位，而且还比2015年的330个席位少了13个议席。2017年大选之前，梅首相尚能较好平衡和控制保守党内各派争执，大选失利后梅首相党内地位动摇，于是采取了拉拢硬脱派的策略，但是保守党硬脱派始终反对梅首相的软脱欧立场，双方很难达成妥协，2018年7月，英国内阁重量级成员、保守党硬脱派成员戴维·戴维斯、史蒂夫·贝克、苏维拉·布雷弗曼、鲍里斯·约翰逊等人先后辞职。

软脱派与硬脱派、硬脱派与留欧派矛盾激化。2018年11月，梅首相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引起保守党内硬脱派的反对。2018年11月15日，保守党内阁就脱欧协议进行了激辩，虽然英国内阁最终勉强通过了这个协议，但是内阁中属于硬脱派的脱欧事务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就业及退休保障大臣艾思特·麦克维等7名要员，因不满脱欧协议而先后宣布辞职，里斯·莫格还成功发动了保守党党内对梅首相进行不信任投票，逼迫梅首相下台。2018年12月12日的党内不信任投票结果，梅首相以支持200票对不支持117票挺过了难关，但是党内不支持票高达117票，不仅是梅首相遭遇的执政危机，也表明保守党软脱派与硬脱派矛盾进一步激化。2019年1月15日，英国下议院进行第一次脱欧协议表决，保守党硬脱派议员投了反对票。2019年3月12日、13日、14日英国下议院先后进行第二次脱欧协议投票、无协议脱欧投票和延迟脱欧投票，保守党硬脱派的立场依然没有改变，他们反对新的脱欧协议，赞成无协议脱欧，反对延迟脱欧，这说明保守党软脱派和硬脱派之间仍没有达成妥协。

保守党内留欧派议员虽然因人数太少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留欧派对硬脱派的强硬态度不满，他们认为硬脱派绑架了保守党。2019年2月20日，3名亲欧派保守党议员安娜·苏布里、海蒂·艾伦和莎拉·沃拉斯顿宣布退党，她们与此前因不满工党左倾转向而退出工党的8名议员联合起来，组建了一个新的组织——“独立团体（The Independent Group）”，决定将以“独立议员”身份进行投票。这3名留欧派议员退党并不会对保守党造成根本影响，但是毕竟削弱了其执政基础，而且对党内其他留欧派议员带来一定示范效应。例如，2019年2月22日，保守党3名留欧派内阁成员戴维·高克、安博·鲁德、格雷格·克拉克就公开表示，如果硬脱派不支持新的脱欧协议，他们将辞职，这表明保守党留欧派与硬脱派之间矛盾尖锐。

英脱欧保守党内主张不一

□ 张少冬

脱欧进程交织保守党派别之争

派别之争将会持续整个脱欧进程。脱欧公投至今，保守党硬脱派议员一直强硬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们实际代表了英国国内长期存在的疑欧甚至反欧力量，只要这种力量继续存在，保守党硬脱派议员就有其民意基础。历史与现实已经证明，英国国内的疑欧和反欧力量将长期存在。1980年代，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公开发表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与不信任，此后这种观点向全欧洲蔓延，被冠名为“疑欧主义”，在强力推进欧洲一体化的法德两国，也都有不可小觑的疑欧和反欧力量。英国疑欧和反欧力量之所以格外突出，主要在于大英帝国的辉煌历史及英国远离欧洲大陆的特殊地缘环境，使英国对欧盟存在更强的离心倾向，这是英国保守党硬脱派很难改变立场的基础。脱欧公投前，保守党硬脱派公开与本党领袖卡梅伦唱反调。2019年1月脱欧协议表决时，保守党硬脱派成为投反对票的主力之一。欧盟对新的脱欧协议作出一定让步后，2019年3月保守党还是有75名硬脱派议员投了反对票。保守党硬脱派这种坚定的疑欧和反欧立场，决定了保守党党内派别之争将持续整个脱欧进程。

派别之争将与权力之争继续交织。西方政党政治的权力之争既有不同党派之间的竞争，也有同一党派内部夺权的相互倾轧。英国脱欧进程中，保守党内证经常与党内权力竞争交织在一起。卡梅伦首相辞职后，特蕾莎·梅之所以于2017年提前进行大选，实指望通过赢得大选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既扩大保守党的下议院席位，也借机打压党内反对力量，同时也改变脱欧进程受党内外掣肘的被动局面，但是大选失利后梅首相外受民众和反对党要求下台的压力，内受本党争议，当时保守党内就有议员提议由鲍里斯·约翰逊或菲利普·哈蒙德等党内比较有影响力的议员取代梅首相，好在梅首相及时在党内作了诚恳致歉，重新获得党内原谅和支持。虽然保守党内软脱派议员占多数，有利于梅首相开展脱欧工作，但是党内硬脱派议员非常强势，2018年硬脱派内阁成员两次集体辞职，以及里斯·莫格发起的党内不信任投票，实际就是对梅首相的变相逼宫，而时至今日，保守党内仍不时出现要求梅首相下台的呼声。因此，无论脱欧与否，保守党内的权力之争始终存在，只不过这次因与脱欧这一重大事件相撞，增加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尽管原定于2019年3月29日之前英国要完成脱欧，但是就目前进展来看，英国脱欧将是一场持久战，保守党几大派别的内争也将与权力之纠纷缠不休。



（上接1版头条）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产业转型、制度改革、环境改善、脱贫攻坚等方面都面临很多新的风险挑战，还有很多难点需要破题闯关。越是这样，越得靠实干、靠奋斗。我们要发扬斗争精神，冲锋在前、直面矛盾、攻坚克难，动真碰硬、担事不怕事，以敢打必胜的决心和勇气，坚决打赢这场21世纪的“平津战役”。

在新阶段协同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天津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过程，就是自身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新时代天津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出路。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一基地三区”定位，严格对标对表，清单化、项目化推进，着力深化产业协同、创新协同、体制机制协同、环保协同、基础设施建设协同，以天津之为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健全北京非首都功能承接转移机制，进一步明确承接的功能、产业、项目，积极引进先进制造、总部经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医疗机构、金融机构等优质资源，打

造一批标志性工程。抓紧建设一批小而精、小而专的“微中心”，开辟功能疏解“第二战场”，推进“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等承接平台创新发展，开工建设国家会展中心等重大项目。全力支持服务河北雄安新区建设发展，加强产业对接、交通互联和开放合作。

全面提升城市品位和服务功能。严格对标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高标准编制我市国土空间规划，打造现代化城镇体系，与北京共同发挥在京津冀城市群发展中“双中心”引领作用。高水平建设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持续深化天津港口岸降费提效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以志在万里的气魄建设世界一流的绿色港口、智慧港口，启动天津机场扩建工程。加快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推进京滨、京唐城际铁路建设，启动天津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联络线等项目，做好津雄城际、津承城际、京沪高铁二通道等前期工作。加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盘活用好小洋楼资源，放大“五大道”地标影响力，全力打造世界知名的历史文化街区。

更加主动谋改革求开放求创新。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树牢市场理念，强化改革思维。发挥改革开放先行区作用，推进京津冀全面改革创新试验，深化“通武廊”地区一体化改革，推进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自由流动、优化配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市属国有企业混

合所有制改革，加快落实支持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措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天河三号”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级基础软件创新中心、中科曙光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落地建设。做优做强实体经济，深入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建设以“天河一号”超算等为代表的自主安全可控全产业链。深入实施“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引育急需紧缺的人才。发挥好滨海新区带动作用，推动出台实施支持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全力打造自贸试验区升级版，积极开展首创性、差异性改革探索，高标准完成改革任务，推进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建设。高水平办好世界智能大会、国际矿业大会和夏季达沃斯论坛。积极推进“鲁班工坊”建设，打造“一带一路”标志性品牌。

以更大力度推进生态建设。深化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严控燃煤、工业、扬尘和机动车污染，确保PM2.5年均浓度持续下降。加强水环境协同治理，完善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强化渤海湾污染协同治理，加强陆源污染防治，全面推进地下水压采，联防联控地面沉降。加快中心城区与滨海新区之间736平方公里的绿色生态屏障建设，严格实施分级管控，加大增绿、补水力度，营造大绿野趣、郁郁葱葱、鸟语花

组工作内容增加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推动中央和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实落细。

打造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选好配强农村党组织书记。实践证明，基层党组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骨。因此，要紧紧抓住组织振兴这个“牛鼻子”，全面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打造更多坚强的战斗堡垒，为乡村振兴提供组织保障。通过推进基层党建重心下移，把党支部建在村民小组，有效激活了党组织的“神经末梢”，

脱贫攻坚工作中逐步构建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组织领导和考核评价体制机制，为推动政策落实落地提供了重要保障。将这些经验做法应用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将为乡村振兴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撑。比如，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乡村振兴统筹管理体制机制，将乡村振兴纳入基层政府工作绩效考核的评价体系等。海南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充分借鉴运用脱贫攻坚作战体系和工作框架，整合现有的各级脱贫攻坚战斗队和驻村工作队力量，向全省所有乡镇、行政村派驻乡村振兴工作队，将省委脱贫攻坚督查

（上接1版二条）一方面，仍然有脱贫任务和已摘帽的贫困村要充分利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市资本、技术、人才等发展关键要素加快向乡村流动这一重大机遇，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高治理能力、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有效防止已脱贫人口返贫，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确保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另一方面，要充分借鉴运用脱贫攻坚经验做法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需要强有力的体制机制来保障其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在推进脱